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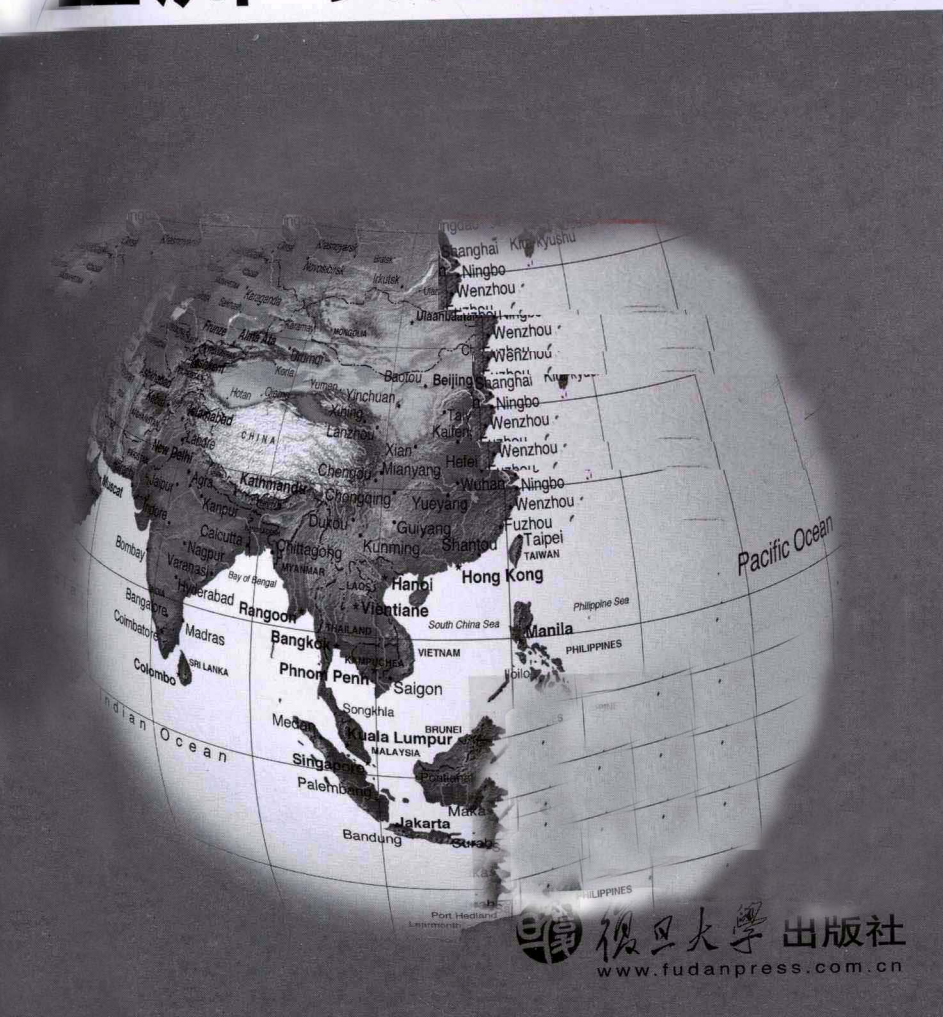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亚洲研究集刊》第五辑

亚洲：文化交流与价值阐释

Asia Research Center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亚洲研究集刊》第五辑

亚洲：文化交流与价值阐释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文化交流与价值阐释 /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7- 309- 07664- 6

I. ①亚… II. ①复… III. ①文化交流—研究—亚洲—文集 IV. ①G130. 5-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9343 号

亚洲:文化交流与价值阐释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编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8 字数 326 千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7- 309- 07664- 6/G · 925

定价: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亚洲:文化交流与价值阐释

亚洲论坛

晚清中国阐述“亚洲”所延续的“历史记忆”

——兼论作为“他者”的日本与朝鲜 章 清 / 3

评论 王晓秋 / 24

东北亚的环境文化:交流与移植 包茂红 / 25

评论 石源华 / 35

晚清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价值观差异 王晓秋 / 37

评论 王立诚 / 42

试析“日本资本主义论战” 冯 玮 / 45

评论 李 玉 / 60

儒教在近代韩国的命运与走向

——以儒教系新宗教“更定儒道”为中心 金 勋 / 64

评论 徐洪兴 / 74

再论金泽荣与翰墨林印书局 邹振环 / 78

评论 程郁缀 / 105

总结发言 吴志攀 / 107

专 题 研 究

论甲午战争对日本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影响	冯 玮 / 115
日本陶瓷业的发展与餐食器皿艺术化的关联	徐静波 / 132
吉田松阴前期对外思想及其思想来源述析	吴 笛 / 141
美国与“日台条约”谈判	金 莹 / 154
在“作文”中了解战时日本小学生的“上海印象”	徐 青 / 165
俄罗斯消极中国观的表现及其根源	赵世锋 / 178
试探巴色会李朗神学的教学实务与组织系统初探 ——以一份新近刊布的陈安仁自述稿为主线	肖 澜 / 184
五四前后学生形象的转化 ——以《学生杂志》为中心的讨论	刘宗灵 / 194
“徽宁商帮”初探	李 甜 / 207
中国视觉艺术传播六十年	汤筠冰 / 218
图像化时代与眼睛的历史性	高 燕 / 226

附 录

2008 年世界能源大事记	239
2009 年世界能源大事记	245
2008 年国际金融大事记	251
2009 年国际金融大事记	266
2009 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结项课题	277
2009 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课题	282

亚洲论坛

晚清中国阐述“亚洲”所延续的“历史记忆”

——兼论作为“他者”的日本与朝鲜

章 清*

本文拟探讨晚清中国阐述“亚洲”所延续的“历史记忆”。有关晚清中国对“亚洲”的阐述,论者已多有所论,不过问题主要围绕“亚洲”本身,尤其是对照于日本展开^①。依拙见,检讨晚清中国对“亚洲”的阐述,或有必要置于晚清认知“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毕竟“亚洲”的言说是在从“天下”到“万国”的转换中凸显的;同时,晚清认知“亚洲”的“他者”——朝鲜与日本,也需结合起来考察。不唯如此,审视这些问题时,还需要超越个别思想人物的言论,关注其他文本。本文即试图依托延续“历史记忆”的特殊媒介形式——“策问”及教科书,以此来呈现朝鲜与日本作为“他者”的“形象”。“历史记忆”在晚清被唤起,算得上事出有因。遭逢“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变局”,使“记忆”的“仓库”广为开启,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外来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有裨于揭示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些面向^②。将“外来因素”具体到“亚洲”意识的催生,并且关注于特殊的媒介,审视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如何延续,或能获得新的视野。这里的关键是,无论是“策问”还是“教科书”,都具有特殊意味。“策问”是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教科书同样是体现国家意志的产物。基于此,“历史记忆”之延续如何构成晚清思想演进的象征,

* 章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这方面的研究参见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台湾大学历史学报》2003年第30期。最新的研究参见孙江:《“东洋”的变迁——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东洋”概念》;黄东兰:《“亚洲”的诞生——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亚洲”概念》,均收入孙江主编:《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中华书局,2008年,第3—26、27—46页。

② 王汎森分析了清末历史记忆的复活,以及服制等生活传统之隐而复现,如何影响到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一群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上的选择。沈松桥则透过晚清知识分子对中国“民族英雄”系谱的建构,讨论了历史书写与国族想象的关系。参见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思与言》第34卷第3期,第1—18页,1996年9月;沈松桥:《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第77—158页。

也随之得以“呈现”。重要的是,“传统”或“历史”是如何“发明”的,“历史记忆”以怎样的方式延续?^①

一、“天下”:缺席之“亚洲”

问题仍需从所谓的“天下”说起。孟子尝谓:“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②不可否认,在中国传统资源中,也包含着对政治秩序的安排。今人解其意,即指出“这至少在形式上已接近西方政治学上以土地、人民、主权来界定‘国家’的说法”^③。然而,“天下”、“中国”与“四夷”的区分,又意味着这与现代社会界定“国家”的区别所在^④。这在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著名论辩中,已有清楚阐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与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⑤这段被广为征引的话,确有其重要性,强化了“道尊于势”的理想,体现出读书人关于中国文化高于朝代兴替的看法。陈寅恪(1890—1969)也注意到,每当朝代更迭,身逢其间的士人,其“品行之隆污”与“学术之歧异”,或不可以一概而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⑥。这也正如论者所强调的,古代中国主要“将中国看成一文化体系,而不是一定的政治疆域”,过去的“天下”一词也具广狭二意,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⑦。钱穆(1895—1990)在论述“国”与“天下”的文字中,还将此区分为“心胸之知”和“耳目

①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② 《孟子·尽心下》。注曰,“诸侯正其封疆,不侵邻国,邻国不犯,宝土地也。使民以时,民不离散,宝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宝政事也。”见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1001页。

③ 参见余英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收入氏著:《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8页。

④ 葛兆光结合各种地图,揭示了关于“天下”的想象及对“中国”的认知。见《天下、中国与四夷——古代中国世界地图中的思想史》,《学术集林》第16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此据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86年,第471页。

⑥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361—363页。

⑦ 参见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收入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第425—478页;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1996年9月。

之知”^①。

无论如何解读,“天下”在中国文化里是有其象征意义的,并且与士大夫的角色及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天下有道”,正构成了士大夫的精神凭借和立言基石。由此检讨晚清在新的语境下对“天下”的论辩,也有相应的基础。

接下来会讨论到晚清科举改制中强化了了的考试体裁“策问”,不妨作些补充。“策问”乃早已有的体裁,其历史甚至比科举还要早。从历代状元殿试中,就不难发现其中以“天下”立说的情形。所谓“偃武修文”、“德化天下”之类,正说明“天下”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可以看到,尽管“策问”中涉及具体论述“天下”的内容并不多,但其呈现方式还是颇为突出的,这更说明尽管何谓“天下”不甚了了,“天下”也并非地理知识上的存在,但“天下”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却成为帝王言说的核心。所谓殿试策问,除了以“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开篇外,往往都有这样大同小异的表示:“朕绍承大统,抚御万邦”,或者说:“朕寅绍丕基,抚绥寰寓”,“朕寅承洪绪,统驭寰区”。尽管用词有所不同,却都要表达这样的意思,一是其权力来源的统绪,二是强调其统治范围。这样,“天下”(或者是“寰宇”、“万邦”之类的字眼),也成为一种象征。而且,不单帝王关切于此,在此引导下,士人对此的认知也是如此^②。不过,透过“状元策”对“天下”的阐述不难看出,以“天下”设问,更多的是一种习惯性的姿态,除了有关于特定时期的“边靖”,鲜少实质性的内容,只是符合所谓的“治道”。尽管是“策问”,与八股文也未必有什么不同。在晚清科举考试中,也不乏这方面的题目,譬如,光绪六年庚辰(1880)科会试卷“钦命四书诗题”第二题即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此为出自《中庸》的题目,所收王咏霓(1839—1916)、沈曾植(1850—1922)等人的答卷,就显示出受制于八股文的程序,鲜少新的气息^③。

强调“天下”构成言说的中心,并无意否认传统中国缺乏对于其他“国家”与“民族”的认知。《史通·二体篇》言及《春秋》有这样的话:“夫春秋者,繫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书写周边民族乃至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也算得上中国史书的一个传统。各代史书大多以“列传”

① 其言曰:“余幼时备闻国人谴责古人,谓其闭关自守,不知有天下,而妄谓国之外有天下。但如中国之万里长城,固可谓其闭关自守,然终不得谓中国古人不知长城外之有异民族同居此天下。唯能于天下内闭关自守,则乃中国文化之长处,而非中国文化之短处。岂西方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所能比。若谓中国古人不知有西欧,则此乃耳目之知,非心胸之知。当时之西欧人,又岂知有中国。”见钱穆:《晚学盲言·国与天下》(上),《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8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418页。

② 参见邓洪波、龚杭云编著:《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上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③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45—5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其中王咏霓此题答卷见第45册,第201—204页;沈曾植此题答卷见第46册,第261—264页。

或“志”的形式,介绍了其他民族乃至国家的情况(主要偏重周边国家,特别是有贡属关系的国家)。清初所修《明史》,西方国家也进入史书的书写。“列传”方面,《土司》、《西域》之外,还包括有《外国》列传。只是,大致说来,中国主要是援据相关历史资源“想象”关于世界的知识。以《明史》来说,尽管当时已接受“天下有五大洲”的知识,然而,却未必相信。内中写道:

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沿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利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尼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谎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①

所谓“其说谎渺莫考”,正揭示出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难以被接受的缘由,这已超越中国本土援据相关历史资源所能进行的“想象”。然又指出“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则表明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毕竟中西之间通过人员往来发生的实实在在的沟通,已难以否认。但总的说来,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观念,还是有很大影响;相应的,关于世界地理方面的知识,也被种种难以证实的“想象”充斥着。至中外发生直接交往,这种局限性就表现出来。如姚莹(1785—1852)所批评的,“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传,多置不观,况外夷书乎?”^②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天下”观主导下“亚洲”的缺席,或不为过。

二、世界构成中的“亚洲”

用不着特别指明,所谓“亚洲”图景的塑造,来自耶稣会传教士的“援西入中”。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明万历十年(1582)奉派来中国。除了传教外,还进行了天文、算学知识的传播工作,绘制了十余幅世界地图。图中绘有当时已知的世界五大洲:欧罗巴、利未亚、亚细亚、南比亚墨利加、墨瓦腊泥加^③。地图之外,成书于明天启三年(1623)的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所著《职方外

^① 见《明史·外国传》卷三二六,第929页,此据《二十五史·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8703页。

^② 姚莹:《华夷著外夷地理书》(《康輶纪行》卷九),见《中复堂全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3309页。

^③ 利玛窦在《坤輿万国全图》的注释中指明“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洲”,该图绘制于1602年,禹贡学会1936年发行。“墨瓦腊泥加”乃想象中的大陆。

纪》，是最早一部用中文编写的世界地理著作，内中包括：卷一，亚细亚洲；卷二，欧逻巴洲；卷三，利未亚洲；卷四，亚墨利加洲、墨瓦蜡尼加洲；卷五，四海总说，介绍了五大洲各国的风土、民情、气候、物产。“亚细亚总说”这样写道：“亚细亚者，天下一大洲也，人类肇声之地，圣贤首出之都”，“其大者首推中国”。还给出了中国在亚洲之地位：“中国则居其东南。自古帝王立极，圣哲递兴，声名文物礼乐衣冠之美，与夫山川土俗物产人民之富庶，远近所共宗，仰其北极。”^①上述对“亚洲”的描绘，不无赞美之辞，然对照卷二之“欧逻巴总说”，可见其中的意味。内中写道：“天下第二大洲名曰欧逻巴。……凡欧逻巴洲内大小诸国，自国王以及庶民皆奉天主耶稣正教，纤毫异学不容窜入。”突出“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而且，“其诸国所读书籍，皆圣贤撰著，从古相传，而一以天主教经典为宗。即后贤有作，亦必合于大道，有益人心，乃许流传国内”^②。对比起来，主要强调欧洲在尚学与信仰上的突出之处。

应该说，将中国定位于“亚洲”，对中国士人的冲击还是颇大的。叶向高（1559—1627）《〈职方外纪〉序》写道：“泰西艾君乃复有《职方外纪》，皆吾中国旷古之所未闻，心思意想之所不到。”而且“其言皆凿凿有据，非汪洋谬悠如道家之诸天，释氏之恒河、须弥，穷万劫无人至也”。瞿式穀《〈职方外纪〉小言》也指出：“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戈戈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③李之藻（1565—1630）《刻职方外纪序》还特别提到：“地如此其大也，而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④

这里清楚显示“亚洲”言说对中国之意义——“亚洲”构成破解“天下”的利器。只不过是“亚洲”之一部分，何言“天下”？不过，所谓冲击，仍只是在部分士人中发生，耶稣会士带来的地理新知，难以被更为广泛的层面接受。《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到《职方外纪》，虽承认其“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却表示“所述多奇闻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介绍到利玛窦《坤舆图说》时更有意思，认为其中所记与东方朔《神经异》和周密《癸辛杂识》等书“全与相合”，因此“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⑤。马噶尔尼（George

① 谢方：《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86年，第32—33页。

② 同上书，第69—70页。

③ 叶向高：《〈职方外纪〉序》；瞿式穀：《〈职方外纪〉小言》，见谢方：《职方外纪校释》，第9—10、13—14页。

④ 李之藻：《刻职方外纪序》，《天学初函》（三），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第1269页。

⑤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一“史部·地理类四”上册，《职方外纪》条，《坤舆图说》条，中华书局，1983年，第632—634页。

Macartney, 1733—1806)使华,在中文世界传递的,也是天朝如何“抚有四海”;远在重洋的外夷,又是如何“倾心向化”,“万国来王”。

继耶稣会士之后,主要是新教传教士担当知识传播的工作。按照学者的揭示,来华耶稣会士为了缓和中国官僚学者对基督教的恐惧和不信任,努力传播了欧洲的“神话”和“神话历史”,中西文化最初的接触实包含中国为世界中心与耶稣会士的欧洲神话的交锋^①。此时,西方所具有的“强势”意味,尤甚往昔。或许仅是坚船利炮,就足可赋予西方知识特殊意味。实际上,这一时期对亚洲的阐述,就有所区别。慕维廉(Willam Muirhead, 1822—1900)《地理全志》卷一“地理总志”之“亚细亚洲全志”这样写道:“亚细亚洲为五洲之最,其内山岭环绕,高原旷野,人文萃聚,物类纷繁,气候冷热适宜,田土腴瘠不等。”但在其中之“政论”部分,言及“学俗”却这样表示:“洲内学俗,优绌不同。昔时为五州灵敏之最,今则大抵衰微颓败。”而在“欧罗巴洲全志”之“政论”部分,“学俗”已改称“学艺”,强调“洲内学艺精备,为五州之最”^②。此外,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所译“西学启蒙十六种”,其中的《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志略》等史志方面的著作,也强化了对“欧洲”的赞誉。《欧洲志略》一书就主要表达欧洲何以强盛,“自中朝之道光初年来,欧洲之大局变易,较前尤甚,至近三十年中,则其局态之变易极矣”。总之,“今欧地诸国政治,较前适宜,民皆愈得自主。而百工技艺,日异月新,信为上世所未有,亦盛矣哉”^③。尚可补充《泰西新史揽要》一书阐述的看法。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在译序中即强调,中国曾经“巍然高出于亚洲为最久之大国,而声名之所洋溢且远及于他洲”,然而,“沿至今日,竟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谁之咎欤,谁之咎欤!”^④

透过新教传教士创办的刊物,大略可了解相关论述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遐迩贯珍》言及中外,主要使用“中土”及“泰西”、“列邦”、“外邦”、“西邦”,也使用“天下”、“瀛寰”包容中外。在传播新的地理知识的同时,还针对中国的相关见解提出质疑。《遐迩贯珍》曾撮要刊登慕维廉所著《地理全志》,其编者按就指出:“尝考中国地理志书,卷轴无几,其中所载,未尽详明,且所纪者,大半只属中土偏隅,而乃名其书曰,天下地舆,未免小之乎视天下矣。”^⑤不可否认,“天下万国”的表述,

① 陈明生:《南怀仁来华耶稣会士的地理学著作(1584—1674)》,魏若望编:《南怀仁——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3—136页。

② 慕维廉:《地理全志》卷一、卷二,见王西清、卢梯青辑:《西学大成》寅编“地学一”,上海醉六堂书坊,1895年,第1、2页。

③ 《欧洲史略》,总税务司署印,1886年,第187—188页。

④ 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上海广学会,1895年。

⑤ 《地理撮要》文后语,《遐迩贯珍》第3卷第6号,1855年6月,第5页。

就外人而言,同样包含着自我价值维护的因素,往往是基于宗教的“普世性”来传递天下一家的情怀。《遐迩贯珍》在一篇文字中就指出:“或曰:各国风俗不同,则各国各从其教,斯可矣。然余则以为人皆同类,教当同宗,合万国为一天父之赤子,且为元始考批二人之裔苗,本当崇信一道,方可敬迓帝眷,而集天休。”^①随后“万国”之意,才逐步落实在超越宗教的“普遍性”的表达上,如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其《凡例》就特别指出,“是书所录条例名为万国公法,盖系诸国通行者,非一国所得私也。又以其与各国律例相似,故亦名为万国律例云”^②。

略加梳理来华西人传播的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检讨晚清中国对相关知识的接受过程,也有了相应的基础。这其中尤值重视的是,中国本土是基于怎样的背景接纳相关的知识,对此略作分析,当能了解接受“天下万国”的缘起及困局所在。马西尼(Federico Masini)谓“万国”一词首出于1854年罗森之《日本游记》,恐不确^③。其实“万国”之名,在中国只是平常的表述,《易·干》即有“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表述,杜佑《通志总序》尚有“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的提法。值得重视的是,所谓“万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同样表述为“万邦、天下、各国”,但与“诸夏”对举,无疑是强调“诸夏”高于“万国”。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尽管中国士人逐步接受了“天下万国”,但所谓的“万国”,究竟何所指,却不无可议之处^④。相较而言,斯时中国士大夫所持有之天下观,所表达的万国,却是天下之万国,仍强调中华在天下的特殊位置,二者适成对照。徐继畲(1795—1873)《瀛寰志略》一书表达中国往往用“中土”,相应的称大地之土为“四土”,即四洲之意。刘鸿翱(1778—1849)为该书所写《序》提到“万国”,仍恪守“夫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故自开辟,神灵继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代天立极,天君泰而百体从令,圣人出而万国咸宁”^⑤。针对丁韪良(WAP Martin, 1827—1916)所译之《万国公法》,斯时中国士大夫所表达的,也不无意味。或者指出:“今九州岛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此丁韪良教师万国公法所由译也。”或者强调:“间尝观天下大局,中华为首善之区,四海会同万国来王遐哉,勿可及已,此外诸国一春秋时大列

① 《续地理撮要终》,《遐迩贯珍》第3卷第9号,1855年9月,第10页。

② 惠顿:《万国公法》,丁韪良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③ 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附录2: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词表”,第246页。

④ 方维规已指出,19世纪下半叶不少书名中有“万国”二字,见《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二十一世纪》,2002年4月号,第33—43页。

⑤ 徐继畲辑著:《瀛寰志略》,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7、6页。

国也。”^①似乎中国是外于“万国”的。因此,晚清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表达,并不能以是否接受“万国”为标志,“万国”本身即可能是“天下”之“万国”。郑观应(1842—1922)对此的论述,大致展现了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即便通商以来,“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照其所见,“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下,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华之法,亦可行于万国”^②。因此,重要的不在于接受“天下万国”,而在于接受中国为“万国之一”,与他国确立“国”与“国”的对等关系。

三、来自日本的“东洋史”

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曾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中国在1898至1910这12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③审视晚清中国对“亚洲”的表述,不可或缺的,正是“日本管道”。福泽谕吉(1834—1901)1875年所著《文明论概略》,曾将现代文明作这样的定位: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为“半开化”国家,非洲和澳洲的国家为“野蛮”国家,还强调了野蛮、半开化和文明是“人类的必经的阶段”^④。福氏1885年提出著名的“脱亚论”,更对日本产生极大影响。如论者所说,“脱亚入欧”在近代日本至少是一个基本论题,福氏名言——“我乃于心中谢绝亚细亚之恶友者”,在以后几乎半个世纪里,至少规定了近代日本路线方针的最基本命题之一^⑤。

正是日本围绕“亚洲”的阐述,直接强化中国的亚洲意识,并基于此产生了新的“认同”。所谓“他者”在这个层面上,也显出特别的意义。梁启超(1873—1929)《西学书目表》史学部分列为首篇的《万国史记》,即是值得重视的一本书。该书在晚清为中国士人所重,宋恕(1862—1910)在给友人信中,即道明《万国史记》“不可不细看一过,并宜广劝朋友、门生读之!”原因无他,“此书于地球万国古今政教源流,言之极有条理,我国人所不能为也”^⑥。那么,《万国史记》究竟哪些方面值得重视呢?这其中对于认识天下与万国的转变,极富意味。重野安绎(1827—1910)撰

① 董恂:《序一》、张斯桂:《序二》,《万国公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② 郑观应:《易言·论公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7页。

③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页。

④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9—10页。

⑤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⑥ 宋恕:《致贵翰香书》(1895年7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533—535页。

《万国史记序》肯定该书揭示出“居宇宙至大，万国至众，林林然各称雄长而无相统一”。尤其以此对照满清，批评中国“殆以万国之史为一国之史也”。内中写道：

吾每阅汉士史乘，至所谓外国传、异域志，未尝不嗤其自小。彼以中土自居，而俨然临万国。虽强大軼己者，不夷狄视之，则藩属待之，其政治得失不相关也，国势强弱不相问也，彼为彼，我为我，其所以自大，即其所以自小。近时有魏默深者，好论海防，能通天下之故，然其著书题曰《海国图志》，是以五洲诸邦为海国也。夫大瀛寰之何往而不然，汉土亦一海国而已，何问大小哉。彼虽国大而不过方数万里。寝处乎方数万里之内，目不接海波，而自外来者，皆帆于海，遂目以海国而自称曰中土。是童观耳，井蛙之见耳。默深以达识著称，犹局于素习而不自察，则其他可知已……

《万国史记》卷一之“亚细亚总说”，除描绘地理上的亚洲，也涉及人文方面的内容，“亚细亚为人类初生之地，他洲人民皆自此转徙。”“洲内诸国，学俗优绌不同，昔时文物制度，卓绝五洲，今则瞠然在欧罗巴之后。”^①这段出自日本学者描绘的亚洲图景，也自有其意义在，对于中国，并没有赋予其在亚洲什么特别的地位。在其他论著中，也指明中国不再是特殊的国家。如《万国地志》言及亚细亚洲政区，不仅先言“日本帝国”，次言“支那帝国”，而且明确指出，“日本而外，皆君主专制之半开国，如支那、朝鲜、波斯、暹罗是也。其次以下，不能独立。虽其地广民众，而已为列强所吞并，为他人所管辖，或称属国，或称保护国”^②。

按照通常的看法，日本之历史书写所影响于中国史学界较早而较大，“大概是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鹭藏的《中等东洋史》两书；更其是前者，因为用汉文写作的关系，影响更大”^③。针对亚洲的阐述，后者更具影响。那珂通世（1851—1908）《中等东洋史原序》这样写道：“叙述欧洲之治乱兴亡，名之谓世界史与万国史，此一偏之见，非通论也。世界文明，非必尽由欧洲，东洋诸国，社会之勃兴，风气之进化，亦不弱于欧洲。东洋大国以四五数，既往现在将来，此国之与彼国，其间关系甚繁，既为国民，于东洋历代之乱治兴亡而不晓晰，可乎？故中学校之历史科，国史、西洋史外，有东洋史之目。近人所著东洋史甚多，然皆详中国而略塞外，若东西两洋之交涉，与中央亚细亚之状态，更挂其一而漏其万，欲求亚

① 冈本监辅：《万国史记》，上海申报馆出版，1879年，第2—3页。

② 日本矢津昌永著，樊炳清译：《万国地志》，见樊炳清编：《科学丛书》第1集上卷，教育世界出版社，1901年，第12页。

③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5页。

细亚古今之大势，终未能了如指掌。予常憾之。迨者文学士桑原鹭藏君，将其所著《中等东洋史》视予，予受而读之，史料取材于东西，而博引旁搜，东洋五千年来治乱兴亡之事变，约而能得其要。予喜此书之出于世，足以激励国民爱国之心也。”^①该书对中国士人的影响，尤其是有关“亚洲”的认知，也起到重要作用。周同愈《重译中等东洋史自序》这样表示：

五洲未通以前，中国庞然自大，以为列于吾旁者，皆小蛮夷而已，不知域中之为东洋，安知海外之有西洋，今人人知有东西洋矣。而东洋之与东洋，百年来东洋之与西洋，国际之事日繁以密，吾中国无一人能举重大要件，勒为一史以问世者，可愧也。桑原鹭藏君《中等东洋史》为日本人所著之东洋史，最晚出最完备之书，前之译者随俗无可称道，又是书于每一国之治乱兴亡与重大要件，一以日本纪元组织其间。桑原鹭藏君为日本人，彼自爱其国，宜其尔尔。译者既为中国人，仍其旧而不为改易，爱国之心何在？予故重为之译。文必求其从，字必求其顺，务合于韩退之寡法而后止。每一国之治乱兴亡与重大要件，之组织之以中国纪元。阅三月而全书告成。凡吾之所为勤劬而不敢忽者，无他故，总以吾爱国之心激动读者爱国之心。^②

陈庆年编纂《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所写“后序”也介绍了该书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桑原鹭藏东洋史自樊炳清译本出于东文学社，其书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庆年在武昌时见诸校印者已有数本，盖自己亥以来四五年间以此为教者相属也，顾其为书世界史之例耳，而于国史所应详者，尚多疏略。”进一步还阐明如何以此为基础编写《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光绪癸卯两湖立文高等学堂，庆年任历史课教文普通学堂，欲以己意缀事别为本邦史，念是邦学子于桑原之书诵习已久，其书于全亚国际之关系最所注意。我邦经庚子之乱，甫阅数年牖以识世界，于义亦急遂不复自为，略依桑原篇题，补集事实，以为此编”^③。

大致说来，关于“亚洲”的论述，更为日本学者所重视，晚清士人主要受此影响催生“亚洲”的意识。这方面的问题不是这里可以讨论的^④，可以补充的是，辻武雄（1868—1931）著《支那教育改方案》就显示，日本学人在思考中国问题时，往往立足亚洲进行论述：“余东瀛人也，少而读圣贤之书，长而涉猎东西百家之论说，每慨

① 《中等东洋史教科书》，标明桑原鹭藏原著，上海科学书局藏版，第1页。

② 桑原鹭藏原著，周同愈译著：《中等东洋史》，上海文明书局发行，1904年初版，第2页。

③ 陈庆年编纂：《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9年初版，第1页。

④ 这方面前揭葛兆光的论文中，已勾画出日本亚洲论述的基本线索。大致说来，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潮要追溯到19世纪前半叶甚至18世纪末期。